

中国渐进改革 前沿热点问题报告

——中央重大决策和高层政要思考的阐释

(内部资料)

下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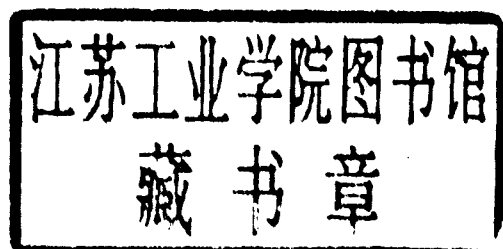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编辑出版研究所

中国渐进改革前沿热点问题报告

——中央重大决策和高层政要思考的阐释

(内部资料)

下 册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编辑出版研究所

二〇〇二年六月一日·北京

目 录

第一编 渐进改革与中国社会转型路径

第1讲	中国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探索的伟大先驱	1
第2讲	刘少奇“天津讲话”和私营经济的再思考	12
第3讲	陈永贵和“农业学大寨”的历史变迁	20
第4讲	建国以来党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	44
第5讲	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策	57
第6讲	邓小平的“北方谈话”与当代中国大转折	68
第7讲	万里与中国农村改革的制度创新	79
第8讲	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前前后后	92
第9讲	渐进改革进程中的政治体制改革	108
第10讲	对“毛泽东热”若干问题的思考	117
第11讲	“中顾委”的设置及其历史作用	124
第12讲	“一国两制”与香港、澳门、台湾问题	136
第13讲	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的历史回顾	146
第14讲	改革取向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创建	157
第15讲	非国有经济的演进路径和市场化改革	174
第16讲	中国渐进式改革的路径选择和制度变迁	186

第二编 政治改革与民主政治制度创新

第17讲	权力过分集中：政治体制改革的焦点	198
第18讲	关于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若干问题	203
第19讲	新的革命：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起步	220
第20讲	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政治建设的思考	230

第 21 讲	发挥工会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	234
第 22 讲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领导制度的改革	241
第 23 讲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不同利益群体的冲突和矛盾	252
第 24 讲	社会协商对话的组织和开展	256
第 25 讲	“第七次革命”: 政府机构改革进展态势及问题	268
第 26 讲	市场经济发展再次呼唤政治体制改革	277

第三编 经济改革与市场经济制度创新

第 27 讲	关于海南开发建设的若干问题	285
第 28 讲	海南“小政府”体制与市场经济实践的调查	289
第 29 讲	农村改革与制度变迁的社会效绩	302
第 30 讲	转型时期高收入阶层现状及成因分析	309
第 31 讲	关于通货紧缩的成因及治理对策	319
第 32 讲	西方国家经济面临的通货紧缩及政府对策	327
第 33 讲	经济全球化·WTO 与中国国家安全	337
第 34 讲	加入 WTO 与中国保险业的市场竞争方略	349
第 35 讲	中国新生财险企业发挥比较优势的思考	357
第 36 讲	转轨时期债转股的政策目标与配套改革思路	370
第 37 讲	渐进改革、WTO 与中国银行业的发展	378
第 38 讲	搞好国有企业需要培育职业企业家	387
第 39 讲	国有企业改革的制度缺失和激励制度创新	393

第四编 企业改革与经济激励制度创新

第 40 讲	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制度安排和绩效考察	404
第 41 讲	国有企业激励机制的缺位与约束的乏力	411
第 42 讲	国有企业改革创新制度的需求和制度安排	421
第 43 讲	国有企业经营者实施年薪制的基本思路	427
第 44 讲	股票期权制度的由来和基本框架	436
第 45 讲	股票期权制度的方案实施与运作程序	443
第 46 讲	股票期权制度运作的政策支持体系	449

第 47 讲	西方国家企业管理层薪酬结构及长期激励机制	454
第 48 讲	西方股票期权制度的实施与发展趋势	464

第五编 产业组织与博彩经济制度创新

第 49 讲	博彩的特殊需求与政府公益事业筹资选择	470
第 50 讲	博彩行为从非合作博弈到合作博弈的政府选择偏好	480
第 51 讲	博彩品种的适度供给与市场、政府约束	489
第 52 讲	博彩业的价值评判与道德诉求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502
第 53 讲	关于博彩业社会收益的实证分析	513
第 54 讲	制度、技术安排和国际博彩业的发展路径	524
第 55 讲	彩票业的市场结构和市场营销创新安排	535
第 56 讲	中国彩票业的制度安排与政府调控	545
第 57 讲	彩票基金管理规制、效绩和重新定位研究	557
第 58 讲	关于博彩和博彩业的若干问题	569
第 59 讲	中央政府决策和福利彩票事业发展	574
第 60 讲	中国博彩业公共政策的初步分析	587

第六编 社会改革与文化思想传承创新

第 61 讲	国学大师陈寅恪晚年的心路历程探析	604
第 62 讲	读《顾准文集》和《顾准日记》及其它	621
第 63 讲	读《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和《忆周扬》及其它	629
第 64 讲	经济学家蒋一苇的科学历史观评述	641
第 65 讲	“吴敬琏忧虑”与中国经济改革	648
第 66 讲	中国出版产业化进程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655
第 67 讲	日本 NHK 对公共传媒文化的探索	658
第 68 讲	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发展道路的再探索	663
第 69 讲	新的突破：从“入局”到走向“体制外”	672
第 70 讲	当代知识分子与民间机构的发展	676

第 33 讲 经济全球化·WTO 与中国国家安全

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信息技术革命浪潮的强烈冲击下,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国际背景中,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和重要趋势,形成了世界经济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和相互依存。目前,我国正在进行加入 WTO 的国际谈判,此举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有重大影响。在面对经济全球化这一世界发展大趋势的背景下,认真研究中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就显得尤为必要。

一、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显著特征

全球化趋势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发展迅猛,势不可挡。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际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二战以后,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国际贸易总体规模在不断扩大,增长速度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而且增长率大大超过了世界生产的增长率。从贸易规模上看,1950 年世界贸易出口额仅为 610 亿美元,1970 年增加到 3150 亿美元,1990 年达到 34470 亿美元,1997 年达到 61000 亿美元。在 1950 年—1970 年的 20 年间,贸易量增加了 11 倍,1997 年贸易额则是 1950 年的 100 倍。从世界贸易增长的速度看,具有加速发展之势。从 1985 年—1995 年,世界贸易额平均增长 5.5%,为同期世界生产平均增长的 2 倍。1996 年和 1997 年国际贸易年均增长都约为 7%,为同年世界生产增长率的 2—3 倍。世界贸易的增长大大高于世界生产的增长。国际贸易原本是为了弥补本国生产的不足,在国际市场上换回本国不能生产或生产不足的商品,获得比较利益。而现在,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国际贸易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世界各国生产的价值,越来越多地依靠世界市场才能实现。

第二,国际金融市场异常活跃。20 多年中,由于生产经营。资本流动和电讯技术的跨国发展,80 年代以来世界金融市场的交易出现了一个飞速发展的高潮。以国际外汇交易、证券、股权及借贷为基础的国际金融市场异常活跃,交易量猛增。世界各国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遍及全球的金融中心和金融机构正在形

说明:1999 年 9 月写于中共中央党校,其中部分内容载于《中国市场经济报》1999 年 11 月 18 日。

成一个全时空的国际金融市场体系,使得资金的调拨和融通变得空前便捷,大大加速了资本流动。当今世界只有打一个电话或按一下电钮,就可以把一笔资金在全球各处自由移动。金融市场的迅猛发展,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催化剂和驱动力,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和重要特征。大规模的国际贸易和投资,跨国公司的全世界经营,离开了金融业的发展和及时的优良服务,是绝对不可能的。国际贸易的发展,跨国公司的全球奔走,促进了遍布全球的金融网络的出现和发达。以世界外汇市场为例,1973年每天的交易额仅150亿美元,1983年就达到600亿美元,1992年迅速发展到了9000亿美元,1997年跃至14000亿美元,为当年中国GDP的180%。外汇交易额与世界贸易额之比,由1973年的9:1,迅速扩大到1997年的100:1。

第三,跨国公司迅猛发展。国际贸易、金融交易和直接投资的加速增长,在宏观上是由国家和国际经济组织推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结果,在微观上主要是由企业跨国界的贸易与投资所带动的,因而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微观活动主体,在全球化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跨国公司的组织形式日趋复杂。由母公司和分布在全球的子公司组成一个金字塔型的结构。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现在全世界跨国公司母公司约有44000家,其外国附属企业约有28万家,其1994年全球销售的商品和服务为6.4万亿美元,超过了当年全球贸易额。全球出口贸易的1/3是出跨国公司完成的,另外1/3是与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生产经营有关的。跨国公司几乎垄断了全球的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国际金融企业和国际技术贸易,估计70%的全球专利权使用费和其他费用的付款额为母公司及其国外附属企业间的交易。在跨国公司中,为数不多的巨型公司在世界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些公司的实力已经超过了许多国家。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1997年营业收入为11.44万亿美元,利润4044亿美元,资产33.27万亿美元、雇员人数达3552万人。营业收入超过1000亿美元的有11家,其中通用电器公司的销售额为1683亿美元,接近我国当年的出口额。全球最大的零售业巨子——美国的沃尔玛,营业收入1997年达1250多亿美元,是我国全年社会零售商品总额的40%。资产额最大的东京三菱银行,1996年的资产为696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57914亿元,远大于当年我国国有工业总产值(50631亿元)。500家跨国公司的利润是我国全年GDP的50%,比我国工业总产值(26755亿元)要多出40%。三菱公司的经济实力要比印度尼西亚大,福特公司的经济实力要比香港大,沃尔—马特公司的经济实力要比以色列大。一些大跨国公司的年销售额可以与大部分国家GDP相比。如1996年英荷壳牌石油公司的销售额超过伊朗GDP;三井与通用电器法国分公司的销售额加在一起,要超过丹麦、葡萄牙、土耳其GDP之和,要比整个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的GDP还多500亿美元。雀巢在世界上160多个国家,电气工程集团在140多个国家设有企业。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在50多个国家开发石油,在34个国家有炼油厂,在150多

个国家销售其产品。

第四,国际直接投资发展迅速。二战以前,资本主义对外经济扩张的主要途径是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而资本输出的方式主要是借贷和证券投资,即以间接投资为主。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取得利息和股息,同时通过借贷关系,对债务国进行控制。二战后,资本的国际化趋势愈益明显,国际直接投资增长速度空前加快。现在,对外直接投资则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和企业扩大市场,获取最佳经济资源的强有力手段。对外直接投资,就是在投资国直接占有生产资料(企业和其他资产),利用那里较优越的生产条件,从事经营活动,开拓当地的资源和市场,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近年来,国际直接投资的规模迅速扩大:(1)国际直接投资存量大幅度增加,1960 年是 680 亿美元,1980 年是 5020 亿美元,1992 年达到 19480 亿美元,1996 年猛增为 32000 亿美元。80 年代后期以来,其增长速度大大加快。其中 1986—1990 年平均年增长率为 19.8%,1991—1996 年达 11.1%。(2)国际直接投资流量增大,1970 年全年的国际直接投资额仅 400 亿美元,1980 年达 1700 亿美元,1989 年为 2320 亿美元,1996 年达到 3490 亿美元,1997 年大约为 3700 亿美元。其增速远远超过国际贸易及世界生产增长速度,1986—1990 年年均增长 24.4%;1991—1996 年为 17.1%。

第五,国际生产和分工进一步深化。生产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前提和基础。资本主义的生产早已发展为世界性生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作《共产党宣言》时就指出了这种情况: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而现今,由于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新科技革命的推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生产的国际化进一步发展了。传统的国际分工正在演变成为世界性的分工,国际分工呈升级态势,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二战前,国际分工的基本形式是垂直分工,其特点主要是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与各自势力范围内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经济落后国家在原料和工业加工领域的分工。这种分工的基础和前提是殖民统治、暴力征服和超经济剥削,造成了经济落后国家市场的萎缩和世界市场的割裂。二战后,随着世界殖民体系的瓦解,国际分工逐渐由垂直分工转向水平分工。其内容为产品型号的分工,产品零、部件的分工和产品工艺流程的分工。这就使国际分工从传统的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分工逐步发展成为以现代工艺、技术为基础的分工;从产业各部门间的分工发展到各个产业部门内部的分工和以产品专业化为基础的分工:从沿着产品界限进行的分工发展到沿着生产要素界限进行的分工;从生产领域分工向服务部门分工发展。这样,随着生产国际化程度的发展和加深,同一产业部门内部不同行业之间的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发展为同一行业内部不同产品之间的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进而发展为同一生产过程内部各种零部件的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以致同一件产品的各种零部件往往来自许多国家和地区,各国经济不断融合、互补,形成新的嫁接优势。跨国公司内部同一产品的不

同零部件生产的分工和协作,是当代世界生产和分工国际化的生动体现。巨型跨国公司把全世界都变成了它的生产车间,零部件生产遍及整个地球。因此,有人说人类已经进入了“组装世界”,整个地球俨然是一个大工厂。比如,波音 747 飞机共有 450 万个零部件,它们是由 6 个国家、1100 家大企业和 15001 家小企业联合生产的。“R-180”载重汽车,其发动机是瑞典制造的,底盘、弹簧是美国提供的,控制系统是德国制造的,车身是意大利生产的,而整车的装配则是在英国完成的。德国西门子股份公司,1996 年在全世界范围内有 379000 名工作人员,其中在国外有 176000 名,在 50 多个国家中有 300 多个生产基地,在 942 亿马克总营业额中 61% 来自国外。这就是说,作为国际投资和国际生产的主要组织形式的跨国公司,在推动横向生产国际化水平不断升级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它在世界范围内优化资源结构和资源组合,生产越来越多的“全球产品”,即生产一个产品所用的资金、原料、技术、劳动力可能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并且销往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促进生产国际化的同时,又加速了资本的国际化 and 世界贸易的发展。

二、WTO 不能没有中国,中国加入 WTO 利大于弊

经济全球化不仅是要实行贸易、投资自由化,而且要开展经济技术合作。贸易、投资自由化及经济技术合作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条件。二战以来,特别是近 20 多年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在全球得以推进,与国家间的多边和双边协议及各种国际组织的推动是分不开的。

1948 年成立的关贸总协定,标志着世界贸易自由化开始了一个新阶段。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以降低关税壁垒为核心内容,积极推动市场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世界关税税率大幅度降低。二战后初期,各国进口关税水平为 40% 左右;乌拉圭回合结束后,所有工业品的加权平均关税水平,发达国家从 6.3% 降至 3.8%;发展中国家从 15.3% 降至 10—12%;转型经济国家从 8.6% 降至 6%。到 2005 年前,药品、农业机械、建筑、矿山及钻探机械、医疗器械、家具、酒、木浆、纸制品及印刷品、钢铁和玩具等将实现零关税。纺织品与服装,从 1995 年起,在 10 年内取消进口限制,到 2005 年 1 月全部实现自由化。农产品重新回到贸易自由化的轨道,所有非关税措施关税化并降低关税幅度和减少对农业的各种支持措施。

在关税税率大幅度降低的同时,非关税壁垒也大幅度削减。90 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减少了其所使用的进口配额、许可证及其他行政规章制度。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研究报告,90 年代,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进口自由化已达到 90% 以上。世界贸易组织保障措施协议将取消自动出口限制和其他灰色

区域措施。主要贸易国经常项目的自由兑换得以实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在 70 年代初取消外汇管制后,又通过了取消无形贸易壁垒管制的协议,这极大地推动了其他各主要贸易国取消外汇管制,使贸易能较为自由地进行。

在贸易自由化的推动下,各国充分认识到国际直接投资自由化不可避免。据联合国贸发会议 1997 年《世界投资报告》,90 年代以来,各国对国际直接投资政策的改革或变化中,95% 以上的内容是趋向于更加自由化的。截止到 1997 年 1 月,全世界共签署了 1330 个双边投资保护协议,其中三分之二是 90 年代以来签订的,涉及 162 个国家与地区,在 5 年里增加了 2 倍。其中有 180 项是在 1996 年签署的。WTO 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知识产权协定》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正在拟议中的《多边投资协议》等都为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改革开放的 20 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从 1992 年起,中国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经济体制上与世界贸易组织相衔接。世界贸易组织现有 135 个成员,还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申请加入。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各国经济的互补性和依赖性增强,世界贸易组织作为世界性的经济贸易组织,没有中国参加是不完整的,长期把发展中的中国排除在世界贸易组织之外,也是不明智的。中国的 GDP 已达 8000 多亿美元,居世界第七位;出口居全球第十位,连续几年吸引外资仅居美国之后,列第二位;中国已经是世界经济与贸易中举足轻重的国家。所以,中国经济及其政策对亚洲、乃至全世界都会产生极大影响。只要世界市场向中国开放,中国更深入地参与全球化进程,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对世界经济将产生积极影响,这对世界是一种机会而不是威胁。对于中国来说,加入 WTO 是机遇与挑战同在,利惠同弊害相生。但权衡利弊,综合分析,加 WTO 对中国的利大于弊。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已经从一个简单的贸易问题逐渐演变成一个重大的政治、经济和外交课题,牵动着从中央决策层到数十亿普通百姓的心。1971 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随之恢复了在联合国所有机构的地位。但中国在关贸总协定的地位却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及时恢复。从 1986 年开始,中国把恢复自己在关贸总协定中的地位问题提上了日程,到现在已历时 13 年。随着国际国内各种事件的发展,在一些国家对关贸总协定及世界贸易组织的操纵下,中国的“复关”和“入世”问题逐步政治化。这个政治化的过程开始于 1989 年。这年中国的政治风波后,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实行所谓的“制裁”,停止了与中国举行的“复关”谈判,以此作为对华实行“制裁”的一个组成部分。谈判恢复后,个别西方国家又把与中国的谈判作为筹码,散布“中国威胁论”,漫天要价,提出了许多中国难以接受的苛刻条件。毫无疑问,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要付出代价的,成本也是巨大的。如果不权衡利弊,慎重对

待,民族经济发展和国家利益都会受到极大的损害。这不能不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全国人民的关心和警惕。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不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此,中国政府的态度是明确的,这就是要积极创造条件加入进去,同时在步骤上坚持不急不躁,水到渠成。因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不能置身于世界之外自我发展。现在世界上的 135 个国家和地区都是 WTO 的成员,还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申请加入。中国如果一直游离其外,将在世界经济交往的许多方面面临种种矛盾和困难。按照西方一些经济学家的理论,一个国家如果是国际组织的成员,它的行为就有了国际规则的保障,就是一个可信赖的国家。现在的一些区域组织和跨国公司不愿意到 WTO 成员以外的国家和地区投资,认为那里缺乏国际保障机制。可以设想,如果中国在今后还不能进入 WTO,外资的流入将大大减少,影响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已经从一个简单的贸易问题逐渐演变成一个重大的政治、经济和外交课题,牵动着从中央决策层到十几亿普通百姓的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不要加入 WTO?对此,中国政府的态度是明确的,这就是要积极创造条件加入进去。1999 年 11 月 16 日中美两国在北京签署了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江泽民主席在会见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时说这是一个“双赢”的协议,这对美中经济发展都有好处。正在土耳其访问的克林顿总统立即发表谈话,表示将全力以赴促成国会解决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问题。那么我们应怎样认识“双赢”的协议哪?中国加入 WTO 还有一些什么问题。

第一,“双赢”协议对我们的影响。既然是一个“双赢”协议,双方自然都作出了让步。目前协议的具体内容尚未完全公布,但至少可以推断的是:美国承认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有了这一条,中国可以对薄弱产业实施相对较长时间的过渡期保护;美国容许中国每年递增纺织品出口量,直至最终取消纺织品配额;美国将在 12 年内防止中国向美出口猛增,期满后中国输美任何商品不受配额限制;美国不再坚持进入中国电信市场控股的要求。从美方公布的信息来看,中国关税将从目前的 22.1% 削减至 17%;中国以“关税比例配额”开放农产品市场;中国将允许美国公司进入银行、保险和电信业务;汽车关税分阶段削减至 2006 年的 25%;中国将取消出口补贴;中国将给予美国出口商分销权等等。从眼前看,中国的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如纺织业等将直接受益,而某些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如汽车业等将受到一定的压力,一些技术落后、竞争力差的企业将加速被淘汰。关税降了,洋货多了,老百姓消费可选择的面儿大了;外资银行多了,外资保险公司来了,服务行业的素质会在竞争中提高。从长远看,加入 WTO 会推动中国改革开放,促进中国按照国际规则办事,更有利于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合作。

第二,WTO 大门距我们还有多远。中美达成了双边协议,中国朝 WTO 大门迈进

了一大步。从中国加入世贸的程序而言,还有两大步要走。第一步,中国与欧盟即将开始谈判。中国目前已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新西兰、土耳其、新加坡、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智利等 13 个成员结束谈判。眼下关键是与欧盟谈判。欧盟代表团将于 19 日抵京,与中方展开谈判。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欧盟的要价并不比美国低,许多要价是比照美国开出的,在金融、保险、航运等服务贸易领域的开价甚至高于美国。估计中欧谈判也不会轻松。除了欧盟外,中国还需要与二十几个尚未结束双方谈判的世贸成员谈判。距离 11 月 30 日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时日无多,要与这些成员完成双边谈判,最佳机会是即将在日内瓦举行的世贸组织中国工作组会议,多边谈判与双边谈判同时进行。如果这一切顺利完成,就将走第二步:在世贸组织中国工作组会议上起草中国工作组主席案文,由 135 个世贸组织成员投票,如果 2/3 通过,中国就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并参加西雅图会议。当然,这是一种乐观的估计。此间经贸专家认为,较大的可能是在明年上半年加入,而西雅图会议上中国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西雅图会议只是确定世贸组织“千年回合”谈判的议题,真正开始谈判是从明年开始,预计历时 3—5 年,目的是制定新世纪国际贸易的规则。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一大好处是,参与世界贸易规则的制定。从这个角度讲,虽然中国不能在今年内加入 WTO,但并不影响中国参与“千年回合”谈判,并分享成果。所以,我们认为中国加入 WTO 至少有五个方面的利益:

首先,我们不能离开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职能来谈它对中国的影响。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职能是制定全球市场运作规则,并监督着规则的执行。全世界市场经济运作的规则,是由 WTO 所有成员通过谈判制定的,不是由哪个国家的国会制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的目标,我们要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把市场同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结合起来。但市场经济不是无序的,而是在一定的市场规则和法制的框架下运作的。如果我们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把国内的市场规则和秩序同 WTO 的框架相衔接,对于我们改革开放是很有帮助的。规则的统一虽然暂时会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困难,但从根本上讲是利大于弊。比如在知识产权方面,一些企业没有严格遵守有关规则,眼前得到了一些经济利益,但不会得到长远的利益。在高科技领域,如果我们不遵守规则,高科技领域就发展不起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在 WTO 的框架下,其他国家也必须按照规则对待中国,发展正常的贸易关系,消除对我们的一些歧视待遇。目前我国在服装出口上遇到许多歧视,当我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后,这些歧视都可以取消。

其次,世界贸易组织举行开放市场的谈判可以使我们从受益。世界贸易组织通过多边谈判,相互开放市场,使各国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这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通过什么方式开放市场,中国 13 年来“入关”和“入世”谈判的核心,就是中国开放市场的

条件问题。任何国家要开放市场都是有条件的,绝不能全面开放,立即开放,无条件开放。在达成开放条件的谈判中,是采用多边谈判方式还是采用双边谈判方式,结果是不一样的。开放市场的双边谈判只有在经济实力相当的国家和地区间展开,才是公平的。多年来中美之间举行了多次双边贸易谈判,几次陷入僵局,剑拔弩张,相互拉开了制裁和反制裁架势,局势相当严峻。应该看到,由于中国与美国在经济实力上差距甚大,如果同样承受 40 亿美元的制裁和反制裁打击,对美国来说只占其出口的 1—2%,无关痛痒,对中国来说就不是无足轻重的事情了。所以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应该避免与强手之间的正面对抗,让实力相当的对手相互进行谈判,然后使双边谈判多边化,分享多边贸易谈判的好处。世界贸易组织中的 100 多个发展中成员都是这种多边贸易体制的受惠者,它们可以在世界贸易组织内搭便车,坐享发达国家双边谈判的成果。中国如果加入了 WTO,就可以避免与强手之间的正面交锋,享受多边贸易谈判体制的实惠。

第三,可以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维护自己的利益。在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合作中,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贸易摩擦。WTO 为解决成员间的贸易摩擦提供了比较公平的解决机制,各成员可以利用这个机制维护自己的利益。在国际经贸关系中我们常常看到 WTO 成员,如美日之间、美欧之间经常为贸易问题吵得不亦乐乎,经常发生贸易战,但这些摩擦并没有影响它们之间的国家关系,它们可以在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内解决问题。而中国目前不是 WTO 的成员,没有正常的渠道解决争端,问题解决不了会影响国家关系。这样的经贸关系是一种脆弱的关系,影响了双方经贸关系的长期持续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参与世界经济活动的增多,国内企业许多与世界经济组织规则不相一致的问题会更多地暴露出来,我们将努力改正这些问题。但其他国家会以这些问题为借口,抓我们的辫子,特别是在国际国内遇到一些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风吹草动时,发达国家往往把经济问题政治化。中国是一个大国,不信邪不怕压,封锁和制裁对我们无济于事。但如果通过正常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就会大大减少个别国家企图把经济问题政治化的可能性,使我国的国际经济交往持续发展,对各方都是有利的。

第四,从长远看我们加入 WTO 有利于增加就业机会,缓解我国目前比较严重的失业状况。就业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跨世纪的难题,也是中国政府下个世纪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加入 WTO 对于我们解决就业问题有无帮助,成为影响我们加入的决策之一。我们是劳动力过剩的国家,加入 WTO,劳动力就业问题就可能跳出我们经济循环的单一系统,就会加入到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通过劳动力密集型产品,通过商品的活动来出口劳动,带动人员的就业。中国出口的多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而进口多数都是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所以说只要能够增加出口,就增加了就业机会。而外国的技术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入中国,会给中国带来一些结构性的调整。结

构性的调整它并不意味着长期的失业而是一些劳动必须从一些行业向其他行业转化,这个过程在世界各国都发生过,中国也不例外,有人模拟了中国加入 WTO 造成结构性失业的情况,建立了一个很大规模、可计算的模型,按照最坏情形进行推测,结构性调整的失业人员,概而言之不超过 500 万。而加入 WTO 就目前来看,如果考虑对汽车行业和其他一些尖端技术行业的一些措施,失业问题的冲击虽有,但也不会过于严重。

第五,加入 WTO 能尽快缩短中国同发达国家在科技发展间的差距。改革开放 20 年,我们同发达国家之间的接触领域不断扩大,双方在进行经济交流的同时,科技交流也日益加强,使我们科技差距部分被弥补掉了。我们不可能一切科技研究都从头做起,那在时间上将减缓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而且在发展成本上也过大,我们要善于站在一定高度来学习人类一切进步科技,有条件的为我所用,这就是我们加入 WTO 的另一个好处。高科技对于各国来讲都是限制输出的,因为它对经济发展及其他各领域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 WTO 组织规定高科技应该由发达国家逐渐向不发达国家转移。这是 WTO 成员国组织的内容的一部分。当然这种转移是部分的、有代价的和一定时间限制的。这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人家花费几十亿甚至几百亿美元的代价研究出的成果,毫无条件地拱手相让是不可能的。但是他至少不可以无缘无故的不给你,如果你不是会员,他就有充分的理由不给你。他会强调这是他的国防秘密,或以政治上、军事上的理由,随便的否定你的权利,对你封销民用技术,但如果你是 WTO 的会员,你就有权利去要求其它国家以更加自由贸易的原则来对待你,这样才能使我们科技发展的速度更快些。

从长远和根本利益上看,加入 WTO 对中国利大于弊。中国在加入 WTO 后,对有些领域肯定是有冲击的,需要有 3—5 年的过渡时期,有些领域过渡的时间可能更长。这就要求中国加紧国内体制的改革,加紧国内企业开放的领域,发展国内竞争,提高各个领域的管理能力,提高国内企业的竞争力。WTO 在世纪之交要进行千年回合谈判,将就进一步降低关税、服务贸易、劳工问题、政府采购透明度和贸易与环境问题展开谈判。中国如果现在能够加入,就可以参与规则的制定,对世界贸易组织施加影响。反之,如果不能加入,将来“入世”的条件会更苛刻,对国内的冲击会更大。就目前来看,我们如果加入后,进行企业改革和结构调整,化冲击为动力,对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增长是有利的。所以,即使从目前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不是一件坏事,它冲击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大。从长远和根本上考虑,中国总是要走向世界的,总是要进行改革开放的,通过开放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这是我们的内在要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正面促进和负面冲击相抵消,最终将是利大于弊。

三、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维护国家安全

一些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和学者鼓吹,在全球化时代国家权力消失了,国家经济边界消失了,主权国家对全球化浪潮的冲击是无能为力的。如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说:“在结束了第三次大的美苏之间斗争的同时,也出现了国际政治性质的根本转变。在现代经济和通讯的影响下,这一转变逐步加快。它削弱了民族国家的重要性,促成了国内和全球经济与政治之间十分紧密的联系。世界事物越来越取决于国内的趋势,后者超越了疆界,并需要由越来越无法以‘主权至上’方式行事的各国政府采取集体对策。”“这一过程不会落入教条式地把世界分成‘善’与‘恶’两种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模式——像 20 世纪大部分时期那样的情况。实际上,它标志着走向意识形态单一化越来越强的趋势,使政府部门控制下和超国家的资本主义成为普遍的社会制度。在这个世界里,超越疆界的政府部门和金融界的联系,由于那日益受跨国大众媒体影响的政治趋势而进一步强化。这种联系逐步使排他性的国家‘主权’论的传统观念变得无足轻重了”这实际上都是在为霸权主义的扩张和侵略制造根据,摇旗呐喊。

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是国家对外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国家是近现代国际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是最有组织、最有能力的政治经济实体。在国际舞台上,虽然也还有国家集团、国家联合实体与非国家实体在发挥作用,但国家始终是国际舞台上活动的主要角色。其他国际政治经济实体基本上属于国家实体的派生体,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主权国家有关。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法中,主权是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主权具有独立性,不依附于国内或国外的其他任何权力。国家主权可分为对内主权和对外主权两个方面。在对内方面,国家主权对其专有领域和居民享有最高的排他性的管辖权,其他国家对此负有不干涉的义务;在对外方面,主权国家互不依附,相互平等,具有独立参加国际关系的能力并能直接承受国际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主权国家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法中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是其他主体所不能比拟的。

在国际事务中,主权国家可以不受干涉地结盟和退出联盟,有参战和保持中立以更好维护自己利益的选择权。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诸因素的综合,是主权国家决定自己的全部对外活动和政策的最重要依据,是国家对外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但是,一国的生存和发展,国家利益的实现,不能在自给自足和自我封闭的状态下进行。在各国的相互交往和联系中,在当今全球化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各国的利益相互交织,密切相关,形成了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或相关利益。不考虑人类的共同利益和与其他国家相关的利益,把本国利益绝对化加以强求推行,必然会同其他国家发生矛盾和冲突,最终损害本国的利益。因此,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国家间的相互依赖性加深,相互影

响增大,共同或相关问题增多,利益交织复杂深化,势必对国家主权的行使带来一定的限制和约束。既然要发生必要的交往和联系,就必须有交往的规则,并为各国所共同遵守,不然就会发生混乱,失去联系的条件和保障。同时,为了维护国家相互联系和交往的环境和条件,解决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各国需要达成一定的协议,建立一定的组织,自愿地让出部分权利。这样,国家主权的行使在无形中或自愿条件下受到了制约和限制。

我们认为,全球化浪潮的兴起是一种客观趋势,同时也有主权国家推动的因素。主权国家遵守世界经济交往的规则,是为了维护和发展本国的利益,一些权利的让渡是以自己的利益为根据的。在全球化条件下,有比以前更多的问题需要主权国家解决,这是其他主体所不能代替的。国际经济组织和跨国公司的权利和活动,都是以国家利益或国家授权为基础。主权国家的作用不是削弱了,而是更大了,更复杂了。英国学者琳达·韦斯在1997年的《新左派评论》杂志上撰文批驳了国家无能的神话,指出了国家要承担的新任务和责任。他说:“国家不是全球化的牺牲品而是推动者”,“全球主义者不仅夸大了国家无能的程度,而且也失之于过分概括,没有看到不同国家的不同反应。实际上,处于动态的经济和国家间体系中的现代国家,适应性是其实质。在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国家的作用不是更小而是更大了,不是在阻滞发展,而是在推动进步。”琳达·韦斯的这个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国家利益中最重要的是国家的生存与安全。传统上,一国的安全主要被看作军事安全、国防安全,即防止外部势力入侵和占领,维护本国领土完整。要达到这一目的,只能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但在今天,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军事威胁、武装入侵、领土被占的威胁依然存在,但总体来看,国家经济发展、资本的安全收益、市场份额、技术状况、资源供应、只起到一定的作用,还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军事力量在这种背景下,更多是一种威慑力量,是施加给对方的一种心理压力,一国试图用军事手段达到经济目的只能丧失其更大的利益。全球化不仅导致国家经济安全利益越来越重要,还使科学技术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成为国家利益安全的新内容。科学技术对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日益重要,特别是高科技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龙头和支柱,谁掌握了高科技,谁就会在21世纪赢得胜利。经济全球化对能力不足或没有规范化管理的政府是威胁,对管理有效、对策得力的政府是机遇。中国要维护自己的经济安全,就必须掌握经济安全的主动权。政府部门要加强对国家经济安全的观察和研究,建立科学的预警制度和应急方案,真正把经济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一项主要内容。目前特别需要高度重视的是金融业、高科技支柱产业、民族品牌支柱产业的安全运行。仅以金融业安全为例,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东南亚国家普遍遭受重创,韩国人怎么也不能接受“汉江奇迹”变成“汉江泡沫”的残酷现实。我国因为金融尚未完全开放“因祸得福”,但现实却给我

们敲响了警钟。目前美国的“金融核弹”杀伤力甚至是人们想像不到的,这种破坏作用,既不是物理意义上的扩张和撞击,也不是化学意义上的催化和化合,而是一种核裂变效应。它表现为受狙击国家的外汇储备的大量流失;表现在受狙击国家的汇率的剧烈波动;表现在受狙击国家的股市大崩盘;表现在受狙击国家的楼市暴跌;表现为国际金融炒家可以利用这一武器获得巨额暴利。人们谈论的索罗斯正是利用这种金融超级高科技武器获得暴利,因此美国这样的金融核大国今后将更多地利用金融手段而不是军事手段介入国际事务,干涉它国内政,乃至打击政府国家。

总之,中国要积极创造条件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而尽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上,要坚持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做到权利和义务平衡。同时,中国要力争在 APEC 中发挥重要作用。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不仅需要广泛发展与 APEC 成员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提出和倡导自己的主张,发挥自己的影响,为自己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